



共和国日记

1955

《共和国日记》编委会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共和国日记

1955

《共和国日记》编委会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共和国日记. 1955 / 《共和国日记》编委会编.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 - 7 - 215 - 11029 - 8

I. ①共… II. ①共… III. ①中国历史 - 现代史 -
1955 - 史料 IV. ①K2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5884 号

出版统筹 陈智英
责任编辑 梁永军
责任校对 郑晓慧
封面设计 杨 振

出版发行 河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65788036)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 / 16

印 张 48

字 数 1228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0 元

共和国日记

195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
当代中国研究所
联合编撰

执行主编	武国友	
副主编	邢和明	
参加编写人员	邢和明	郑林华
	郝鹏飞	王永魁
	王世勇	徐 锋
	朱昔群	兰喜阳
	王永君	谢为红
	沈炜炜	郑建平
	王 玲	斯 琴

《共和国日记》编委会成员

编委会主席	陈奎元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编委会主任	冷 溶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欧阳淞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曲青山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李从军	新华通讯社原社长			
	李 捷	求是杂志社社长			
编委会执行主任	林炎志	吉林省委原副书记			
编委会执行副主任	朱立波	中共中央办公厅			
	张树军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张国良	香港文汇报社原社长			
执 行 编 委	武国友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原主任			
	刘金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原主任			
	齐 彪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原副主任			
	陈东林	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			
	刘国新	当代中国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李正华	当代中国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俊霄	孔祥文	田胜立	曲青山	朱立波
	刘国新	刘金田	刘晓明	刘 敏	齐 彪
	李从军	李正华	李国君	李家强	李 捷
	李 勤	何卓新	冷 溶	汪季贤	张国良
	张树军	张 鹏	张黎明	陈东林	陈奎元
	陈智英	邵 祥	武国友	林炎志	欧阳淞
	周五一	班岳云	蔡国江	樊如钧	
总 策 划	邵 祥				

《共和国日记》编委会秘书处工作人员

秘 书 长	邵 祥		
常 务 副 秘 书 长	田胜立		
副 秘 书 长	刘冬波	汪季贤	武清月
(按姓氏笔画排序)	班岳云	樊如钧	
副 总 策 划	田胜立	刘冬波	班岳云 蔡国江
办 公 室 主 任	刘冬波 (兼)		
副 主 任	班允财		
工 作 人 员	陈 云	于 洁	张丽君
编 辑 部 主 任	田胜立 (兼)		樊如钧 (兼)
副 主 任	王 涛	邵 晨	
主 任 助 理	李天巍		
编 辑	赵 宁	浦凯迪	马 虹 李柏瑾 刘 媛
宣 传 部 主 任	樊如钧 (兼)		
副 主 任	付 琰	李 富	杨成军
外 联 部 主 任	班岳云 (兼)		
副 主 任	朱清振	毕德才	欧阳武
工 作 人 员	郑松培	查怀白	罗兆银
出 版 部 主 任	田胜立 (兼)		
副 主 任	邹朝晖		
发 行 部 主 任	汪季贤 (兼)		
副 主 任	谭卫芳	班钦东	周 冉
影 视 部 主 任	武清月 (兼)		
事业发展部主任	张瑞龙		
副 主 任	班耀福	孙树涛	
法 律 顾 问	刘红宇	李月峰	

序 言



十八大前夕，几位同志来，说他们正在编辑《共和国日记》，一年一本，“十一五”期间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经过五年的工作，即将出版，要我写个序言。

翻阅日记1949年卷清样本，按月、周、日依序写来，仿佛又回到那些激情澎湃的日子。当时我30岁出头，在东北做工会工作。民族危亡中投奔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根据地和国统区，亲见先烈牺牲和身边战友倒下，他们毕生奋斗和为之献身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党的旗帜插遍祖国大地，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随着共和国的诞生来到。当时我在沈阳，在广播里收听北京的庆典，和同志们一起欢呼跳跃。记得当时沈阳举行庆祝建国^①的大会，十几万人涌上街头，全城淹没在红旗的海洋里。我在波涛汹涌的游行队伍中，心情像阳光一样灿烂，唯一的愿望，就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加奋发地工作。

从那时起，60多年过去了，我成为行动迟缓的老人，而我们的党和共和国却永远年轻，每天都有新事物、新创造，真正是日新月异。

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正式出版。这是一部中央审定、无论资料或论述都具权威性的国史稿。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共和国日记》，可以和这部国史稿相映成趣，使国史的庞大架构更加血肉丰满。一个人可以有日记，现在是共和国的日记。为国家记日记，是一种史学创新。编年体和记事体相结合，

^① 指新中国成立。

重现亲历者当时的见闻和感受，特别是引入社会的变化和人民群众的活动，避免过多会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累积造成的沉闷，揽国家民族之命运，察社会百姓之生态，历史就活了、生动了。

中华民族有吸取世界文明成果的博大胸怀和进行新的创造的恢宏气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但是中国岿然不动，站住了、发展了，靠什么？归根结底，靠社会主义，靠我们的党和人民群众。小平同志讲，中国的事情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世界各国的经验很多，需要分析、消化、结合中国的实践，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经验。即便是自己失败、曲折的教训，科学总结，引为借鉴，也是最可宝贵的财富。

现在编写《共和国日记》有好条件。有党的历史决议和党的十八大精神作为指导，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可以参酌，又出版了不少回忆录。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把握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主线，伴随国家发展的脚步，一部一部编下去，一定会取得越来越丰富的经验。

祝贺《共和国日记》出版，愿它作为我们伟大国家的信史，发挥认识过去和创造未来的作用。

2012年12月5日

前言

贯穿本卷的主线是：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出现急速变化的形势，形成迅猛发展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并带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加快步伐。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在外交方面，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并为促使亚非会议成功作出重大贡献。

“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

1955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认为胡风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 and 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要求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随后，全国开展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

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首先是省市以上党委，必须加强对理论工作的领导，在广大人民和党员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在学术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同时，《指示》对正确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提出了若干原则和要求。这些原则和要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学术和文化领域的规律认识的有益探索，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5月中旬，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迅速升级。当时根据从胡风私人通信中断章取义摘编的材料，认定胡风及与他有联系的一些人是一个“反革命集团”。5月13日至6月10日，《人民日报》分三批发表了胡风与友人通信中摘编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为发表这些材料写了十几条措词严厉的按语，为三批材料汇编成册写了序言和按语。于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转变为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5月18日，胡风被逮捕，后来被判刑。把胡风文艺思想上纲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是不符合中国现代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对胡风在不同年代的特定环境下与友人的通信进行摘编，并作为“定罪”的证据，把胡风和同他有联系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当作“反革命集团”来斗争，这样的做法混淆了敌我界限，造成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领域的

一大错案。

在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清查中，又牵连到陈企霞、丁玲。八九月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连续召开16次扩大会议，对丁玲、陈企霞进行揭发批判，错误地认为已经形成一个以丁玲为首，以丁、陈为中心的“反党小集团”。9月，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向中共中央递交《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对他们的政治历史进行审查。12月，中共中央批发了这个报告。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批判及其后错误的处理，在文艺界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出席万隆会议

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的独立大厦开幕，又称万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29个国家的代表团，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

在与会国家中，只有中国和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6个。这意味会议上的分歧和斗争在所难免。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中国代表团在会前作了充分准备。周恩来起草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及其他有关文件，提出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的总方针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中国代表团拟订了两套方案，最高纲领是争取缔结亚非国家和平公约或和平宣言；最低纲领是争取发表一个非公约性的公报，作为亚非会议的具体成就之一。

会议前夕，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于4月11日在飞离香港后中途爆炸坠毁，机上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和随机的中外记者11人遇难。事后查明，这是台湾特务机关针对亚非会议以周恩来为目标制造的一起政治谋杀案。

按照大会的日程安排，4月19日上午，周恩来首先发言。但是，周恩来放弃了这个机会，继续听取其他国家代表发言。下午，周恩来发言。他没有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而是将这份稿件印发给与会者，另外作了一个补充发言。他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他强调“求同”而不是“立异”，说明亚非各国的共同基础是“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周恩来表示，中国在坚持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中国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周恩来的发言体现了和解的精神，获得大多数国家代表的赞同。

随后4天，会议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委员会分别商讨各有关实质性问题，起草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决议、宣言，以及会议最后公报。4月24日，大会一致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当晚，历时一周的亚非会议闭幕。参加亚非会议，是新中国走上国际政治舞台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代表团为促使亚非会议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1955年春，出现了征购过头粮、农业合作化过粗过快的情况，中共中央根据不同地区分别采取“停、缩、发”的方针，对农业合作社进行整顿和压缩。

4月6日至22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沿途看到合作社工作取得成效，认为大部分农民对生产并不消极。回到北京后，5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15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毛泽东批评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根据毛泽东加快发展合作社的讲话精神，各省调整了原计划发展数字。会后，毛泽东再次到南方视察。

6月1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关于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的汇报，批准了中央农村工作部报送的到1956年春耕前农业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的计划。

毛泽东在外地视察期间，沿途召集各省负责人听取农业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汇报。他回到北京后向邓子恢提出需要修改合作社发展计划数字。毛泽东说：1956年春耕前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这个数字同原有的56万个相比，只翻了半番多一点。需要翻一番，即增加到130万个左右，基本上使全国二十几万个乡，除了边疆一些地区外，每个乡都有一个到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作榜样。但是，邓子恢坚持认为，100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是经过调查摸底并同各省商量确定下来的，比较牢靠，不同意修改。

7月31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农业合作化的历史，指导合作化运动的基本方针，作了总结和系统阐述，提出必须先有农业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的观点。报告论述了加快农业合作化的紧迫性，强调国家工业化对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年年增长的需要，同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如果不基本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就不能解决这一矛盾，就会使工业化遇到绝大困难，就不可能完成工业化。毛泽东还批评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右倾保守”思想。会后，各地相继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或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的报告，批判“右倾保守”思想，重新修改本地区农业合作社发展规划。

8月下旬，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经过修正后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逐级印发各级党组织，直到每个农村党支部。

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召开。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作了全面规划，分别不同地区，规定了合作化运动发展的速度。除在某些边疆地区采取比较缓慢的政策外，要求较为先进的地区在1957年春季以前、全国大多数地区在1958年以前，入社农户达到当地总农户的70%—80%，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这个规划，比毛泽东在7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的1958年春季有一半农户加入初级社，1960年以后逐步分批分期地由

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规划，大大超前了。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讲话。他说：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展开，也要在城市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全会还批判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全会结束后，各省、市、自治区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氛围下，再次修改农业合作化规划，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猛烈发展的浪潮。

手工业生产合作加快发展

1955年上半年，手工业合作组织在过去两年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合作社（组）达50000个，人数150万人。从下半年起，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加快了步伐。

12月21日至28日，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召开。会议着重批判了害怕背上供销包袱而不敢加快手工业合作化步伐的“右倾保守”思想，制定了“一五”计划期间基本完成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其总的要求是：1956年组织起来的合作社（组）达到手工业从业人员的74%，1957年达到90%，1958年全部组织起来。这就大大加快了手工业合作化的进程。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全面部署

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工业方面，上海市在进行全行业统筹安排中，率先打破所有权的界限，采用“裁、并、改、合”的方式，创造了工业企业合并和合营的经验。商业方面，北京市选择棉布业、百货业进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试点，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办法，把调整商业网点和改造所有制结合起来，先后在绸布、百货等26个行业中对1019家商店实行联营并店。到1955年6月底，全国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有1900多家，产值相当于资本主义工业的58%。在商业方面，全国32个大中城市，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达52%，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经销、代销的比重占22%左右，纯粹私营商业只占25%左右。

10月27日和29日，毛泽东先后邀请工商界代表人物、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勉励大家认清社会发展趋势，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站在社会主义方面，逐渐转变到新制度。毛泽东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重申国家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将给予政治上和工作上的安排，继续实行逐步赎买政策，这样大家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陈云、陈毅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这次会议是推动全行业公私合营，推动工商界人士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改造方针的重要会议。

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会议，对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作出全面规划和部署。陈云作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报告，提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六条意见。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的规划和部署，按照中共中央决议（草案）的方针和政策，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并在全国形成公私合营的高潮。

凡 例

1. 本书是一部全方位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大型权威性历史文献工具书，用逐日记录的方式，全面准确地从各方面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程，既包括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包括出现的曲折和失误。本书以编年体为主，适当结合纪事本末体。事件发生时间不明确的，或与公开披露时间不一致的，以新闻报道时间设条。

2. 正文条目化，既可参照目录通读了解某时段共和国国史，也可利用索引查检大事（按类别分组、组内按时序排列）、要人（按姓氏笔画规范排序）、发生地（按首字笔画排序）。

3. 本书每年一卷，自1949年卷开始。每卷内以日为单位安排条目，记述当天发生的大事，按政治（含外交、军事和政法）、经济、教科文卫体、社会、其他顺序排列。页眉（同目录呼应）选辑每日一条要事以便读者查检。每卷条目近5000条。

4. 内文分正文和附录。正文由条目正文和日记链接两部分组成（个别日期没有“日记链接”），日记链接部分的文字加网以示区别，该部分收入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的日记、回忆、传记相关内容、有关新闻报道等资料。日记链接的出处在文尾注明。

5. 全书注释采用页下注。人物第一次出现时以页下注标明其时任职务。对旧地名、旧校名等也以页下注作出注释。

6. 摘引当时的新闻或文件均保留当时当地的习惯说法，包括计量单位和数字用法，以维持历史原貌。

7. 本书所选条目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以及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历史著作作为基本依据，注重吸收党史、国史研究的新成果。以当时新闻入条的新华社电讯等不再单独标示。

为了加强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2月8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形式予以发布。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9月27日，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朱德等十元帅授衔。同日，国务院举行授予将官军衔和勋章典礼，周恩来总理为将官授衔。



▲ 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在北京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左一）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元帅军衔的命令。前排左起：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



目 录

1955 年 1 月	1
第 1 周 (1.1—1.2)	2
(国务院举行 1955 年元旦团拜会和戏剧晚会;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	
第 2 周 (1.3—1.9)	4
(毛泽东离京到外地视察;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颁发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决定》;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建党组织员的通知》;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 财政部发出《关于一九五五年经济建设公债的通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春节期间农村宣传工作的通知》)	
第 3 周 (1.10—1.16)	17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 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孙中山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办法的通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第 4 周 (1.17—1.23)	33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 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饶漱石的问题;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收复一江山岛宣传问题的指示》; 中共中央转发中纪委《关于开展工矿支部纪检工作经验报告》; 朱德与邓子恢就广东发展养蚕事业致信中共中央;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伟大的号召下行动起来》的社论; 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的指示稿)	
第 5 周 (1.24—1.30)	46
(周恩来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 陈云参加中共上海局会议; 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 毛泽东审阅陆定一关于修改和发表梁漱溟《告台湾同胞》一文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请中央任免中央管理范围内的干部有关问题的指示》; 朱德听取王德汇报广州市场情况和私营商业改造情况;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